

---

《东南学术》2012 年第 3 期

---

# 划拳中言语和手势隐喻认知研究

——基于对川渝和福建客家地区的调查

江桂英 李 恒

**摘要:** 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本框架,在对川渝以及福建客家地区划拳中的隐喻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的言语隐喻大多基于人类的共同经验,而手势隐喻则遵循象似性和认知经济性原则,两者均符合概念隐喻理论的基本假设。要对隐喻的运行机制做出更好的解读,还必须从神经科学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做出考察。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实现言语和非言语证据的汇聚归一,既有利于巩固概念隐喻理论的信度,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关键词:** 概念隐喻理论; 言语隐喻; 手势隐喻; 神经认知; 文化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2)03-0273-08

## 一、引语

在 Lakoff & Johnson(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揭露了亚氏将隐喻等同于修辞方式的谬误后,隐喻从此高飙突进成为研究思维方式的显学。将心智重新归还给身体,是认知语言学标榜的原则之一。但早期研究所依据的现象学方法和单凭直觉内省的研究范式却使其不断地面对困难和挑战,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是首先主观臆造出各种映射,再人为编造例句使二者契合。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不再受到欢迎。大而无当的宣言式理论更无法掩盖此起彼伏的质疑之声。以 Handl & Schmid(2011)等人为代表的认知社会语言学派进而提出不应以纠缠表面语言现象为归宿,而应回归真实语料,将形而上学的语境摒除在隐喻研

---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22G005) 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江桂英,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李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究之外。加强该学科中的实证研究,以阐发深层次认知机制为出发点,强调多方证据归一的观点正逐渐成为主流。

认知语言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多个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等浸淫于整个研究系统,不断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如何走出“语言既是隐喻存在的唯一证据,同时也是唯一动因”(江桂英,李恒,2011:948)的逻辑怪圈,实现多方证据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交汇介入是摆在当今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工作法,数据驱动则更能保证研究的信度,选取划拳中的隐喻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在该语篇中同时存在言语和手势隐喻,前者是隐喻研究的传统对象,而后者则是近年来多模态隐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概念隐喻理论视阈下,从神经科学以及文化认知多视角出发,将划拳中的言语隐喻和手势隐喻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既可以廓清不同形式隐喻共有的经验基础,更可以将以往研究中缺失的文化因素重新置入研究视野之中。

## 二、划拳中隐喻的例证

划拳是我国自古至今仍风靡流行的饮酒游戏,主要作用是增添酒兴,营造气氛。各地区的划拳基本规则大致相同,出单手伸指喊数的范围为一至十,并附之以吉利语句。划拳时口中所喊字数,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以三或四字为多。行酒令时每轮由两人参与,同时出拳伸指喊数,猜中两人所伸手指之和者胜。本文主要选取四川、重庆以及福建客家地区行酒令中的划拳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地理范围覆盖中国西南以及东南地区,两地跨幅较大,文化差异明显,可以避免实验材料的单一性和偏向性。为保证实验语料的真实性,我们在上述各地通过实地采访调查,通过录像和访谈等手段记录语料,基本可以囊括这些地区的划拳表达。

### 1. 言语隐喻

划拳依靠喊数和出拳配合完成。由于该游戏一般是在喜宴或逢年过节的酒桌上进行,游戏者划拳时往往避免只叫出单调的数字,而是配以带有良好祝愿的吉言,并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喊出。川渝以及客家地区的喊数方法大致相同,祝辞多用典。如表示数字“四”的“四鸿(大)喜”,系指“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发现,隐喻是祝辞语言的一大特点。认知语言学的基本信条是:语言并非先天自治,而是身体与周围世界互动体验的产物。语言的体验性或曰主客观性在于其既反映客观世界的基本情况,又不能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而先验地存在,是一种基于人类身体进化并涵蕴于社会日常生活实践的涉身性。隐喻自然也不例外。

隐喻的两大构成要素是相似性和映射。首先,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主要

基于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捕捉到的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Lakoff & Johnson (1980: 113) 认为隐喻的基础在于“经验的对应性 (correspondence) 和相关性 (correlation)”。如前述地区的酒拳表示“八”时,常用口令为“八匹马”。这源于古时周穆王驾八匹骏马四处游玩,曾在昆仑山瑶池与西天王母诗酬谢唱的典故。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在古代马是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基于此经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马就成了速度的象征,意为祝福对方在事业、生活等方面能够快速前进,永不懈怠。陆俭明(2009: 45)也曾用例句“那家伙,老狐狸一个!”来表达同样的观点“在人的千百年的经验中,狐狸是被认为是在动物中最狡猾。所以在说到某人狡猾时,为使表达生动、形象,不直接说某某人狡猾,而说某某人是个狐狸,从而让听话人从狐狸的狡猾去联想到那个人跟狐狸一样狡猾。”由此可见,人们依靠自身的体验而使用隐喻。

其次,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映射方向从具体到抽象,二是隐喻的系统性。如表示“一”时,便可说成“一心敬你”。此处主要体现容器隐喻 HEART IS CONTAINER。这类本体隐喻的特点在于,“把事件、活动、情感、思想等具有连续性质的、抽象的经验看作是不连续的、有统一形体的实体或物质”(文旭、叶狂, 2003: 5)。因为敬意和美好祝愿是一种主观体验的抽象概念,无法像实物能直接传递,而隐喻的作用正是借具体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抽象事物。于是有了以“将酒盛入杯中”意指“将情意装入心里”。此外, Lakoff & Johnson (1980: 81) 认为隐喻还具有系统性。这是由于经验具有格式塔特征,一个概念隐喻可以派生出多个自成系统的隐喻表达式,这也是隐喻之所以被认为是思维方式的主要原因。既然“情意”这个抽象概念得以具体化,除了能被“装杯”外,还可以如实物般传递,对方也能对其进行接收。类似的表达还有表示数字“七”时,所喊的“七(乞)个巧”。相传农历七月初七,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民间妇女比穿针引线,斗巧取胜,祝贺织女喜会牛郎。民间妇女因希冀如织女般心灵手巧,所以“乞巧”,因“乞”、“七”谐音,故之。日常生活中,高超的针线技巧只能通过训练才能习得,而不能像事物一样乞讨得之。但是抽象概念可以通过隐喻得以实体化,而实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能够实现所有权的转让和传递。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男耕女织,因此妇女具有娴熟的针线技巧尤为重要,该隐喻同样来源于生活经验。又如,客家酒拳中,如果单纯喊数,可以被重复的数字有三、六和九,如六六(六六大顺)、九九(久久长)。除了音韵上的限制外,二者在古代均表示多,叠字重复的意思为“多上加多、多多益善”。主要依据为概念隐喻 MORE IS GOOD。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团结力量大,通常情况下,当人数众多的时候,一件事情就会完成得比较好,这就是该隐喻的理据所在。

## 2. 手势隐喻

手势是近年来隐喻研究的热点问题(如 McNeill, 1992; Nunez, 2008 等)。但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伴语( co - verbal) 手势层面,即使用者说话时伴之以手势,如教学手势( Nunez 2008) 等;而对于划拳这一独特的文化习俗,则不论国内外学界关于手势隐喻的研究都几乎为空白。

在我们调查的地区内,划拳时,双方要先互相握手,以示尊重或以礼相待;出拳时,游戏双方距离也相隔很近。这两个姿势主要体现 NEARNESS IS CLOSENESS。不难看出,手势隐喻同样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当人们表现亲密、爱慕等情感时,总是尽量缩短双方的距离。川渝的酒拳规定,只要是出一个以上的手指就一定要出大拇指;除必须出五个手指外,尽量不要出小指,出拳时大拇指最好保持竖立朝上的姿势,大拇指方向必须是指向对方,而不可以翘向自己,否则就被认为自以为是;手指的出现顺序也基本遵循凡出拳必定有大拇指、离大拇指越近的手指优先出现的原则。这些手势主要与概念隐喻 MORE IS GOOD、UP IS GOOD 和“中心—边缘”图式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方向越往上,意味着位置越高,容易“高瞻远瞩”,所以“上即是好”。身体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具有中心部位( 内脏等) 和边缘部位( 毛发等),而每个部位也可以进一步区分中心和边缘。大拇指因其离身体较近、体积较大,所以被认为是中心成员。中心被看作比边缘更重要,因为人们通常认为,靠近中心的器官具有更加重要的功能,例如心脏等。

Reddy( 1972) 提出的有关语言的管道隐喻( conduit metaphor) 则能对手指朝向的理据性提供启示。他把抽象的言语交际比作具体的实物传递。人类的交际活动目的在于交流思想和感情,但是抽象概念的交流无法直接实现,必须依靠我们语言的语言——隐喻,才能完成犹如有形实物传递的过程。人们在说、写时把思想或感情装进词语里通过隐喻这个“管道”,传送给对方;再由听、读者从词语里接受这些思想和感情,例如“Language transfers meaning”。与此同理,出拳时的手指方向,意即将敬意/不敬放入手势中传递给对方。所以在隐喻的表达过程中,语言并不是唯一的“管道”,说和写也不是唯一媒介,手势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而按照概念隐喻理论,该类隐喻可被归为自体隐喻。这类隐喻的特点之一便是将社会地位和情绪等抽象概念投射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加以确切。

但是当数字有多种表现时,某些地方的手指结合也存在一些避讳,同样体现了人们的认知规律。例如,在四川少数地区表示“二”时,不可同时伸出食指和大拇指。由于该手势在形状上类似“枪”,于是有“枪指他人”的嫌疑,所以应该避免使用。同样地,客家酒拳中表示“零”的手势为五根手指捏合,掌心朝下,不可握成拳,避免“出拳伤人”之嫌;另一方面,手指呈捏合状,也意味着“财不外露”,犹如将财富放入密封的容器内,这里主要是容器隐喻在发挥作用。该手势也用于表示“五”,区别是掌心朝上。按照概念隐喻 SEEING IS KNOWING,掌心朝下,表示挡住人们的视线,意即“看不见即是没有”,而掌心朝上则是将五个手指同时示人,表示数字“五”。

用手指表示数字在不违反上述忌讳手势时,还必须遵守邻近原则,即当邻近的两根手指能表示某个数字时,绝不使用相隔较远的手指。例如,表示“四”时,川渝地区(拇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组合)和客家地区(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组合)虽然使用的四指不同,但都一定相邻。又如表示“二”时,就不可能采取大拇指和无名指结合的方式,因为这与人类的生理构造不符,不利于出拳的方便,体现的是认知经济性。

McNeill(1992)认为,手势主要包括象似性、隐喻式、指示式和强调式四种类型。根据我们的分析,划拳中的手势主要包括前三种类型,这些手势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相互交叉,例如隐喻式手势常常和象似性手势不可分离,因为二者的功能都是描绘图像。以上对手势隐喻的分析不仅证明了概念隐喻理论的正确性,也增大了其应用范围。

### 3. 言语和手势隐喻的神经科学解释

要想对隐喻本质是思维方式的论断作出充分的论证,脱离生理与物质基础,将大脑和身体独断地分裂,依靠单纯的逻辑分析,是不可能穷尽认知所有的奥秘。隐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大脑和神经系统内部结构的深入探索。哲学上称为“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要求我们将所有认知议题还原到认识神经元和其中生物大分子的构造及反应过程才能最终把握隐喻的思维本质。而关于大脑的研究,在经验层面上,由于大脑机制的复杂性和不可及性,长期以来,只能借用黑箱类比的方式加以研究。

Lakoff 等人近年来抛弃逻辑发展的角度,因为撇开复杂的大脑内部系统、机制去研究外在东西,无助于对认知机制的研究。他们转而坚持将操作化和客观实证的研究方法应用于隐喻研究,将逻辑论证和神经生理学结合起来,试图将大脑这样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箱子展示在众人面前,这对早期的概念隐喻理论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Lakoff(2008)认为,无论是言语隐喻还是隐喻性手势都可以从神经科学角度加以解释。在这当中,镜像神经元、想象力和心智模拟功能必不可少。镜像神经元的主要功能为连接前运动皮质和顶叶皮质。前者的主要功能为在脑中重现复杂的行动;而后者则负责感知。当我们执行某动作或者观察别人执行该动作时,连接感知和行动的神经元便得到激活,前运动区域的神经元能对动作进行重现,而他人也能通过镜像神经元对动作加以理解。除此之外,该过程还有赖于神经元的心智模拟功能。“人们在概念中想象自己执行某动作时,被激活的神经元与实际执行该动作时大体相似。这是人们掌握语义的基础。”(江桂英,李恒,2011:949)例如,当表达数字“1”时,人们需要同时想象出有关“1”的具体场景。如果不能想象出来,就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而同时发生的手势通常用相同数量的手指来表示,这些都是通过无意识的想象得以完成的。

以划拳中的数字“1”来说,一方口喊“一心敬你”同时伸出大拇指时,首先需

要在大脑中对该场景做出模拟,能依靠镜像神经元对动作进行预演。而有关言语和手势的知识能通过神经元的共同放电形成回路,当二者形成一个整体时,便发生了神经黏联(neural binding)。而主要由镜像神经元组成的大脑汇聚区(convergence zone)则能将顶叶皮质感知到的信息和前运动皮质区的运动信息连接起来。人们做出“一”的手势时,对“一”的模拟能激活前运动区控制手指运动的神经元;而与前运动区皮质相邻的布洛卡区域(Broca's area),同样分布着连接言语和听力的神经元。而口中喊“一”时也能激活控制概念结构的神经节点。因此,言语和手势在表达上存在共同的生理基础。神经病理学的证据(Nunez 2008)表明,口吃者在手势的表达上同样存在中断的问题;而阻断说话者的手势也同样会影响其语言表达,这显示出二者在表达上的同步性,同时也更进一步说明了言语和手势在大脑中能够相互激活、互相影响。

从神经科学角度对隐喻作出解释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从大脑角度对言语隐喻和手势隐喻做出的解释,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隐喻存在的生理基础以及其具有的心理现实性。

### 三、文化对隐喻的影响

主张体验主义的认知语言学试图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去探究认知过程。其优势在于它坚持反对二元论和形式主义的客观主义倾向,走出了不同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第三条路子;但其劣势在于将作为知识来源的身体及其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打上了深深的自然主义烙印,研究者企图凭借对语言的内省和敏感度来穷尽对思维方式的研究,既无预测性更无证伪性,在认识论层面容易带有浓重的理想化和相对主义色彩。早期的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置于一个将文化因素剔除在外的真空,过分注重认知机制的共性探索而忽略了对文化差异的个性诠释。如今,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语篇概念引入隐喻研究之中,目的就在于调和隐喻作为思维社会集合和思维认知集合之间的矛盾。Talmy(2007)把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六类,其中就包括文化系统。他认为各系统之间交叉重合,相互影响。Lakoff 和 Johnson(1980: 57)其实也并不否认文化对隐喻的影响,“每一种体验都发生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更准确地说,所有的经验都是文化的以至于文化已经体现于我们的经验之中了”。因此,要想对隐喻做出更为全面科学的解释,就不应当忽视社会认知层面,如环境背景作用、经验情感方面、文化和历史因素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等。Kövecses(2005: 4)认为隐喻的共性体现在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之中,但是文化在各语言的复杂隐喻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忽视。我们还是以划拳中的隐喻为例,以探寻文化和不同模态隐喻之间的关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对于划拳中言语隐喻和非言语隐喻的影响程度不同。综观之,在

不同地区的酒拳中,非言语隐喻常常比言语隐喻的差异性要大。这是由于,在其发展历程中,为了经济文化交流的方便,当权者常常对作为主要交流媒介的有声语言加以统一和规范;相对而言,基于象似性的手势受到的限制则较小。辜正坤(2004: 80)认为,象似性是人类语言早期状态的主要特征,任意性是随着语言的系统性日趋成熟而慢慢增强的。因此,手势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任意性的不断冲击,加之象似性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因此不同地区在手势表现形式上差异性也较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川渝以及客家地区都同属华夏文明,其文化共性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上述地区表示数字的行酒令基本相同,莫不与中国历史经典故事有关。如表示数字“五”时,划拳者常喊“五魁首”,意指古人苦读《诗》、《书》、《易》、《礼》、《春秋》五种经典,以求功名,夺得魁首。

其次,不同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如川渝地区表示“二”时通常不出现 V 字型手势,而以八字指(即拇指和食指做出八字状)代替,这除了上文所述使用大拇指以体现 MORE IS GOOD 的原则外,还与当地的传统文化有关,因“八”谐音“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划拳人对 V 字型手势表示“二”的接受度,与使用者的年龄成反比。合理的解释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 V 字型手势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而年龄稍长者,接受新事物则比较滞后。

另一方面,即使表现形式相同,其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可能存在差别。例如划拳中表示“三”的手势与西方的 OK 手势完全相同,但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则风牛马不相及。在欧美,OK 最初是美国铁路扳道工人的用语,当他们确认铁路上一切运行正常时,就会说 All correct(完全正常)。由于 All 音接近“O”,correct 音近“K”,为了方便,工人们就将其省读为“OK”,而手势也主要是模拟字母“O”和“K”的形状。但是在川渝以及客家地区,受访者给出的解释是,该手势中食指和拇指所围圆圈表示“团圆美满”,完全与字母无关,与西方对该手势的解读大相径庭。又如,在手指朝向上,川渝地区大拇指必须朝向对方,以示尊重,而在比较传统的客家文化中,即使是大拇指也不可指向人,以避“指指点点”之嫌。

#### 四、结语

苍白无力的语言论证之痛实际上是认知语言学的科学化之痒。对于探索隐喻思维这项复杂的工程而言,仅仅聚焦于语言证据是远远不够的。打破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些先验预设,对基本概念进行元反思,不断挖掘新视角,避免陷入单向解构路径,加强实证研究力度,为研究合法性提供认识论基础,是该学科得以蓬勃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划拳这一中国独特的文化习俗,也正是人们用以表达认知、习俗和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是认知语言学涉身性的具体表现。本文以传统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石,引入神经科学和社会认知的最新成果,对川渝和福建

客家地区划拳中的言语和非言语隐喻进行了分析,不仅再次确定了概念隐喻理论自身的信度并且大大扩大了其应用的效度。打破传统研究中将二者分离的思维方式,而引入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是为完善认知语言学中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格和寻求研究范式“多元一体式”整合的一次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 Kovecses Zoltan.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2008. The neuroscience of metaphoric gestures [A]. In Alan Cienki & Cornelia Müller (eds.), *Metaphor and Gestur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83 – 289.
- McNeill, David. 1992. *Hand and mind: What gestures reveal about though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unez, Rafael. 2008. A fresh look at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Gestu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 In Alan Cienki & Cornelia Müller (eds.), *Metaphor and Gestur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93 – 114.
- Reddy, M.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A].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4 – 297.
- Sandra Handl & Hans – Jorg Schmid. 2011. *Windows to the mind: metaphor,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C].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Talmy, L.: 《认知语义学十讲》,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 2007 年版。
- 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江桂英 李恒 《概念隐喻研究在神经科学中的新进展——以心理现实性问题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 年第 6 期。
- 陆俭明 《隐喻、转喻散议》,《外国语》2009 年第 3 期。
- 文旭、叶狂 《概念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年第 3 期。